

婚礼不能被异化为炫耀性消费竞赛

文/杨朝清

一项调查显示,70.6%的受访者觉得婚礼仪式必不可少。对于传统的婚礼仪式,34.5%的受访者认为有文化内涵,各种流程不可缺少,31.5%的受访者认为流程过于繁复,花费较大。72.0%的受访者认为婚礼最重要的是给当事人留下美好的记忆,59.2%的受访者认为是家人朋友的祝福。

(6月12日《中国青年报》)

中式的、西式的,城市的、乡村的,隆重的、简朴的,不同的人既具有不一样的生存生态,也具有不同的“意义之网”,导致婚礼的五花八门、千姿百态。在参加好友婚礼的时候,他的舅舅一句“祝贺你成人了”,让笔者印象深刻。如果说结婚登记意味着法律上契约关系的建构,举办婚礼则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

在传统观念里,作为一种关系性的存在,中国的个体只有扮演好一生中各种各样的角色,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维持血脉的延续是中国人家庭生活中的最重要职责,进入婚姻意味着一对新人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举办婚礼旨在让一对新人的社会角色得到了亲友、邻居、同事等熟人社会网络的见证、认同与祝福,



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在仪式感上多玩一些花样。不论是在婚车车队上讲排场,还是雇佣婚庆公司进行创意策划,抑或在酒席的菜肴上彰显档次,一些人往往利用消费上的差异,来建构阶层边界与身份认同,来塑造“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与成就感。

经济因素不断去嵌入日常生活,让许多人认为婚礼仪式就是一个“烧钱”的过程。实际上,婚礼仪式固然少不了花钱的地方,却不能本末倒置;婚礼仪式更在乎心意,而不能通过炫耀性消费来赢得“脸面”。

用沙画还原两人相识相恋的过程,伴郎伴娘一起表演节目,邀请嘉宾登台参与互动……一些不怎么花钱的婚礼仪式,却能够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影响。

婚礼仪式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福,犹如平凡日子里的一束光。尽管如此,婚礼仪式如此并非程序越多越好、花钱越多越好。一方面,对于传统婚礼中陈旧、落后的“文化枷锁”,如“闹婚”习俗要勇敢说“不”;另一方面,双方长辈要和新人们弥合“碎片间的缝隙”,不能顾此失彼。如果融入了过多的功利与算计,婚礼仪式就会走调、变味了。

需要一定的仪式来赋予这个日子与众不同的意义。

婚礼具有公开性和象征性,使它成为一个社会表现和社会竞争的舞台。为了赢得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为了“脸面有光”,一些家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与财力。婚姻需要仪式感,却不能被仪式感所伤。那种“打肿脸充胖子”甚至不惜举债透支型消费的做法,让一些家庭陷入了虚有其表的“表面光”的困境。

在一个讲究热闹、追求吉利的地方性、区域性婚俗文化中,要想在社会表现和社会竞

高考试题有争议不能给分了之

文/何勇

6月11日,河南省招生办公室发布一则公告:今年,我省高考继续使用全国统一卷(I卷),其中理综第8题答案选A选B均给6分。

(6月12日《大河报》)

截至目前,除了河南省之外,使用全国统一卷(I卷)的河北、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安徽、山东、山西等10个省份,已全部发布公告,均称理综单选第8题两个正确答案“A”或“B”都得6分。这对这道题目选择B选项的考生而言,选“B”也算正确,也得6分,无疑是最好的补救措施,不让考生吃亏,维护考生利益。要知道在高考这样的考试中,区区1分就能挤掉上千人,一道6分的选择题极有可能决定一名考生是上一本,还是上二本,或者是上专科的命运。但是,这件事情却不能就这样给分了之。

首先,这道引起考生、老师争议的试题,到底有没有问题,是不是一道错误的题目,必须有一个准确、权威的结论,不能

由各省给出的模棱两可的说法。因为这是一道单选题、客观题,正确答案有且只能有一个。从目前各省发布的公告内容来看,明显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一面都说这道题本身没有问题,没有错,那么按照这个说法,正确答案应该只有一个,那就是“A”,“B”不能算正确答案。另一面却又考虑到不同群体从不同角度对该试题必选项有不同理解,考虑到教学实际,B选项也是错误说法,也算正确答案。既然题目本身没有错,就不能因为考生的理解不同而算错题,设置出两个正确答案,这样的处理,俨然是和稀泥,也损害了高考的严肃性。

再者,如果这道争议的试题确实不够严谨,属于一道错误的试题,理所应当按照目前各省高考招生考试主管部门的做法,考生选“A”或“B”都对,都应得分,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高考试卷的命题部门及其背后的命题专家应该站出来给考生一个说法,必须为试题

出错事故公开向考生道歉。同时,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启动追责机制,对出错试题的命题老师进行问责,倒逼命题老师提高责任心,今后命题时更加严谨、科学,更详细、认真地查阅资料。

实际上近年来各省高考试题出错或者引起争议不是个例,比如,浙江高考作文题将英国作家菲尔丁的国籍错当成美国;全国卷语文题搞错了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年份;江苏的高考作文材料中,山洞中的蝴蝶应为蛾子;陕西的英语试题出现了选项重叠现象……造成这种现象,除了命题出错不被追责,起不到遏制作用之外,最主要原因是高考命题太过封闭。高考试卷命题专家组成员虽然包括大学教授、中学在职教师和学科教学研究者,但占比最高的是大学教授,而他们对中学教材内容和中学生状况却了解不够,很容易引起考生产生误解的试题,甚至是超纲题目。从这个角度看,高考命题组成员应增加熟悉中学教材和中学生的中学教师比例,适度降低大学教授比例。



谐 音文字
趣 人生



“功”与“躬”

文/石川

立功,自古以来就与立德、立言一起,被看成是人生的“三立”。大凡正常的人都是希望立功的。

可在历史和现实中,有些人能事随所愿,不仅劳苦功高,而且功勋显赫,让世人不时地想起和念及;有些人则是不好不坏,平平淡淡,其音容笑貌往往随着生命的消失而消失;有些人则正好走向初始愿望的反面,不仅未有立功,相反却造下了罪孽,为世人所诟病。

三种不同的结果,决定于在立功实践中的不同表现。有些人愿意身体力行,并久久为功,于是乎玉汝于成;有些人经常立志却不立常志,于是乎“东一榔头,西一斧头”,没有弄出一样值得可歌可颂的事情;有些人却想一套做一套,知行不一,只可能导致失败的人生。

由此,便自然让人想到了“功”与“躬”的关系。

从字面上看,“功”与“躬”似乎只是同音,意义上并没有什么关联。“功”,除了有时表达功夫、功率之外,主要是指劳绩、成绩或成就、成效,是一种让他人和社会有所感觉的进展、进步或好处,是一种受人称颂与赞扬的劳作成果。“躬”,本指人的身体,但常常“躬”“行”并用,现常引伸为身体力行或亲身实践,是一种亲力亲为和努力的行动,是一种真心的投入与付出。

但从“功”的取得和实现规律看,“躬”的行动却是“功”的获取的基础与前提,“功”的铸就则是“躬”的行为的浇灌与打造。

从“功”与“躬”的关系可以看出,影响“功”获取的因素有很多,但自身的投入和躬行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这一条,其它的条件再充分,立功的愿望只会是镜中的月亮和水中的花朵。

纵观历史,那些创立功勋迄今被人们传颂的人物都是伟大的躬行者。神农尝百草,才发明了谷物种植和药物采用。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躬亲劳苦,手执工具,与下民一起栉风沐雨,同水患搏斗,才治好了“浩浩怀山襄陵”的大洪水。秦始皇征服了六国,才建立了封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并统一了度量衡,确立了郡县制。李冰父子坐镇指挥都江堰,才建成了伟大的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变成了“天府之国”。蔡伦是一次又一次对各种

材料进行比较和试验,才发明了“造纸术”。郑和是亲率舰队远征,才实现“三宝太监下西洋”。李时珍用尽毕生精力,广收博采,才著就了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如此等等的为人类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虽已远离我们有成百数千年,但他们的名字却随着他们的功绩永远地活在后人的心中。

当今时代,那些为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各种家们更能使人切实地感到,他们为人类所立的大功不是只有理想而没有行动,而是始终围绕着心中的目标坚持做、做坚持,反复做、做反复,攻破一个又一个难关,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是化败为赢,是积小胜为大胜,积量变为质变,积小功为大功的。他们无一不是美好理想的躬行者。

有人可能会说,为人类立下大功的人毕竟是少数,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天赋,所从事的也是普普通通的平凡工作,也没想立什么大功,立功兴许只是一种奢望,难道也需要“躬”的表现吗?

其实,历史和现实都已反复证明,只要拥有正常的思维和意识,任何人任何工作任何岗位都可以为人类而立功,只是立功的层级有大小之分和轻重之别。但立功从来就没有等、靠、要来的,它等于1%的天赋加99%的汗水,是立功的愿望连上辛勤的付出。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职责范围内让人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各种实事,就是立功;干好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各种好事,也是立功。只要将“功”与“躬”结合在一起,任何人都可以为这个世界创下宝贵的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抑或是两者的兼备。

人生在世,应该要有为人类立功的良好愿望,并养成“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关键是有了美好愿望,就要有切实的行动,要像蚂蚁啃骨头那样一点一点地啃,像愚公移山那样一锄一锄地挖,为立功的良好愿望不断地躬亲、躬行和躬耕。

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其实都在书写着自己的历史。要想拥有立功的闪耀历史,就不可缺乏躬行的生动现实。



扫一扫,转发美文